

温立三 著

语文课程的

当代视野



YUWEN KECHENG DE
DANGDAI SHIY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温立三 著

语文课程的

当代视野



YUWEN KECHENG DE
DANGDAI SHIY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文课程的当代视野/温立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5004-6384-9

I. 语… II. 温… III. 语文课—教学研究—中小学
IV. 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5182 号

责任编辑 史慕鸿
特约编辑 陈立民
责任校对 尹 力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292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顾振彪

我国语文课程教材建设的关键在于改革，改革的要义是创新，而改革创新又必须把握我国百年来语文教育的经验和借鉴国外母语课程教材的先进经验，在这基础上探索改革的思路和方案，从而创建我国新时期语文课程教材的新体系。温立三同志的这部《语文课程的当代视野》，正是在总结我国百年来语文课程教材的经验教训和汲取国外母语课程教材先进经验的基础上，阐释对语文课改的思考和建议，因此它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总结传统，借鉴国外，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占有充分的资料。立三同志是个有心人，长期以来，他一直没有放松对传统与国外这两方面资料的搜集和积累工作。但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百年来语文课程教材的原始资料浩如烟海，实在难以搜集得系统全面；国外的母语课程教材的资料更是罕见，第二手的评介材料倒是有一些，但不是原汁原味，难保不打折扣。幸好立三同志受邀参加一个国家重点课题的研究，这个课题组下大力气搜集了我国清末至今一百多年来不同时期各个阶段的多种版本的语文教科书、教学大纲（课程标准），以及世界五大洲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母语课程教材，这终于使立三同志占有充分资料的夙愿得以实现。

第二步的工作是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现代科学的教育理论的指导下，对大量资料加以扒剔梳理，下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扎实工夫，从而真正分清其精华和糟粕之所在。这步工作比第一步工作难度更大。立三同志从师范大学毕业后，当过几年语文教师，取得了实践经验，又在北京大学读硕士，经过了学术研究的严格训练；又到人教社从事语文教材的编写、研究工作十几年，所编写的教科书和所发表的研究论文质高量多，这都为他完成第二步工作奠定了基础。

传统语文课程教材，作为历史的产物，本身就是一分为二的，有精华也有糟粕。一部分因特定时代、特定阶段的需要而产生，明显地带着时代、阶级的局限，在当今天时代要加以批判和抛弃，这就是传统中的糟粕。一部分则符合民族的生理心理特征，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当今天时代要加以充实和发展，这就是传统中的精华。这两部分往往相互联结，相互渗透，这就需要做过细的科学的鉴别和剖析。立三同志在这部著作中做了大量这样的工作。例如：“文以载道，借文明道”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传统。让学生读经，目的是为了明其中的“道”，即儒家之道。这种读文明道的传统，有其局限性：教育为维护儒家道统服务，偏重文章内容而忽视文章形式；也反映了一条阅读规律：阅读文章要抓住思想内容的精髓。立三同志对这个传统的积极意义和消极面作了科学的分析，从而提出：“文道并举，在进行语文训练的同时渗透思想品德教育。”顺便提一句，眼下语文教学中出现离开语言文字空讲人文性的倾向，就是重蹈了古代语文教育重道轻文、以道害文的覆辙，可见摆脱传统的束缚是多么艰难啊！

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背景、教育传统和语言文字的不同，各国母语课程教材必然存在很多差异乃至相反的东西。不过既然都是母语课程教材，也必然有相似、相同的一面。尤其是今天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益呈现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文化、教育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势必使各国母语课程教材中相似、相同的因素越来越多。在这部著作中，立三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对国外母语课程教材的经验作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梳理和分析，从我国国情出发，看哪些经验适合于我们，哪些经验未必完全适合，哪些经验根本就不适合。例如，在国外，高中阶段集中单一的必修课程设置已基本不存在，增设选修课成为普遍的做法。据统计，早在20世纪80年代，在60个国家中高中开设选修课的国家占76.7%，20年后的今天，这个比例只会更高。开设选修课有助于顾及学生的原有基础、自我发展方向和学习需求等方面的差异，能为每一个学生创设更好的学习条件和更广阔的成长空间，促进学生特长和个性的发展。显然，这条经验是适合于我国的，毫无疑问应该吸取。至于在具体做法上，诸如高中语文选修课开多少门、哪些门、怎样开等，就不能只看外国了，而要从我国国情出发，自行定夺。又如：西方母语课程教材历来重视语法，一般编有以语法知识为主的语言教材。这条经验就不适合我们，不能搬用。因为西文属于表音文字，学习西文必须以语法为“帮手”。而汉字是表意的方块字，有

自己的特点，无须像西方那样通过学习语法来掌握语言。

继承不是目的，借鉴也不是目的，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创新才是目的，这就是第三步的工作。立三同志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工夫，这部分内容也成了这部著作的亮点。例如，书中第七章在考察外国高中母语选修课程设置现状和回顾我国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的历史以后，用近万字的篇幅阐明对当前我国高中语文选修课程改革的几点思考。主要是：立足国情，借鉴外国和港台地区经验，增加必修课的分量，减少选修课种类；减少国家规定的选修课，增加地方和学校自定的选修课；调整选修课的结构，可以根据五种不同情况开设五类不同的选修课，使选修课更能满足不同情况学生的不同需要；研究必修课与选修课各自的目标、内涵和定位等问题，正确处理必修课与选修课两者之间的关系；减少现行选修课教材的类同和重复，大力培植精品教材，真正实现选修课教材的多样化。平心而论，这几点思考中，不乏真知灼见，对深化当前的高中语文课改不无裨益。又如：书中第五章“历史坐标中的综合型语文教材”，第六章“中西不同背景下的分科型语文教材”，在充分占有古今中外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对母语教材从综合型、分科型的角度，做了科学的梳理和剖析，总结它们的特征、类型、演变轨迹、编制模式、理论基础、长处及不足，最后得出结论说：“根据中西方各自的思维习惯、文化传统和语言特点，语文教材在综合与分科两方面各有侧重，但无论选择哪一种，另一种必成它的补充而非阻碍。只有这样，语文课程教材才能不断走向完善。”当前语文教材改革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怎样建构语文教材的模式，并实现教材模式的多样化？我想从立三同志的论述中可以获得不少启示。又如：书中第二章“语文课程教材建设的继承与创新”，第三章“21世纪初的初中语文课程教材改革”，第四章“民族化、科学化、现代化的语文教材编制”，立三同志用深邃的历史眼光与开阔的国际视野，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语文教材如何体现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尊重多元文化统一的问题。

这本著作中的另外一些章节，例如第九章“语文课程改革潮流中的中学鲁迅作品”，第十章“语文课程改革背景下的课文名篇解读”，同样显示了立三同志扎实的学术功底和较高的专业水准，这里就不多说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立三同志将要到人教社工作时，社里有关部门介绍他的情况，举了两个例子：没有钱买专业书，就把饭票卖掉，饿着肚子也要买书来读；父亲身患绝症，同学自发为他募捐筹款，他婉言谢绝，说不能

要同学的钱。当时听者无不佩服。立三同志的勤奋、硬气和廉洁，来人教社后人们有目共睹。有一位社领导称赞他即使在主持中语室工作期间，也不多拿国家一分钱。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有人这样解释：“什么叫不惑？就是人能够自觉按照中庸的理念去思考、行事，即使外部世界给你许多不公正、打击、缺憾，你也能在一个坐标上迅速建立自己应有的位置。”立三同志正值不惑之年，凭他的勤奋、硬气和廉洁，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迅速建立自己应有的位置。这本专著的出版就是一个证明。

有一位全国著名的特级教师，读了这本书中的一些章节后感慨：“人教社后继有人啊！”又有一位全国著名的语文教师甚至说：“一二十年之后，立三必有成就！”为了祖国的语文教育事业，立三同志，努力啊！

2007年8月

当代社会文化转型与语文课程改革

(代前言)

中国社会正处在又一个转型期。这次转型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主要标志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转型突出表现为社会经济模式的变化和随之而来的旧的政治、文化模式的松动，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但渐进求稳的改革开放使旧有模式变化缓慢，而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国内外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使中国社会转型一度变得步履维艰。几年之后，改革的大船再度扬帆启航并加速前进，其显著标志是市场经济政策的确立和实行，社会转型进一步加速。

现在的中国并不是西方人眼中的真正市场化国家，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之下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的不同关系进行一番比较。在计划体制下，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高度整合的关系，计划经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和一元主义文化三者之间高度一致，互相协调，共同维系着体制的稳定；在市场体制之下，也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模式，即自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这就是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在他的有关著作中所阐述的思想：特定的经济制度与特定的政治制度、文化价值三者是无法截然分离的，而是内在相关的，比如在经济上选择了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就不可能选择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也不可能选择文化上的一元主义；而选择了计划经济，必然与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文化上的多元主义无法共存。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中国特殊的国情，当今中国社会，经济上推行较为灵活的市场经济政策，而政治和文化的变革却较为谨慎。所以，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并未实现充分的协调一致。目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现实，是经济改革的步子走得较快，政治和文化的改革进展较慢。也就是说，当前的中

国，政治和文化的改革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缩小话题：文化和教育的改革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文化和教育长期处于计划体制之下，是为计划模式的社会服务的。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和教育的改革虽然一直没有停止，但由于问题众多，涉及面广，关乎社会稳定，所以改革显得缓慢，难以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这样，经济改革与文化、教育的改革产生了难以克服的矛盾。文化和教育领域出现的许多问题，大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

多年来语文课程改革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可以置于这样的大背景中来思考。

一、意识形态与语文课程改革

意识形态是一定时期占统治地位阶级的价值观念体系。意识形态总是极力维护现存的关系（统治阶级的权力），压制“异己”的力量，所以，要推翻这样的关系并消除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不容易。马克思曾经预言，随着阶级社会的终结，在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也必将终结。

预言“无阶级社会”的来临也许过早，但淡化意识形态的年代似乎早已到来。20世纪50年代，随着西方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斯大林政权的结束和苏共20大的召开，在西方社会学界曾出现了一股“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潮。这股思潮以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和他在1960年出版的著作《意识形态的终结：论50年代政治观念的衰落》为代表。丹尼尔·贝尔在他的另一本著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解释“意识形态终结”的具体意思是，50年代，“激进运动的旧的政治观念已经衰竭，不再有力量在知识分子中以强制的方式获得忠诚和热情”；美国与西欧知识分子在放弃了激进理想和社会革命立场之后，普遍地“接受福利国家、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概念。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的论争时代业已结束”。这一概括比较符合当时的国际情况。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改革开放的国际大背景之下，中国旧有的意识形态显得逐渐不适应新的时代，特别是在90年代全面推行市场化之后，历时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较量趋于缓和，意识形态问题本身开始悬置起来（所谓“不争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实际上确立了这样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经济建设是

我们面临的中心任务,意识形态的建设不应该干扰、偏离这个中心,而应当无条件地服务于这个中心;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方向是坚持改革开放,认真学习、汲取国外的优秀文化成果和先进的管理技术;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这意味着,强调了几十年的旧有意识形态越来越淡出,姓社姓资之争逐渐退居后台,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口号突现出来。总设计师的“白猫黑猫”论显然很务实,更具民族感召力。

长期以来,语文课程是我们党和国家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窗口,它在计划经济时代为统一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起到重要作用。历史进入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形式发生了改变,意味着思想文化教育中负载的意识形态也要适当进行调整。而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语文课程,存在着严重的“左”的旧痕。所宣传的某些意识形态,在其他领域早已被悬置起来了,而在语文教育领域仍非常流行(最具代表性的是每篇课文必有一个权威的、意识形态性相当强的所谓中心思想),这显得与时代发展很不相称,并往往远离语文本身。这样,语文课程的性质、目的、任务,语文教育观念、方法、手段,甚至语文教材的选文标准和文章解读等,就难免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持民间立场的人的质疑和批评。现在,语文课程要以传承中华民族语言文化为己任,以博大的胸襟吸纳他民族优秀文化,而不以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灌输为主要甚至唯一任务,这已成为许多语文教育工作者者的共识。

二、人才培养模式与语文课程改革

在计划体制之下,培养人才完全是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即号召全国人民为建设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于是,该由谁上学、上哪个学校、学什么专业、毕业分配到什么部门、从事什么职业等,都由国家统一包办,个人没有选择的自由,人人成为整个国家大机器上的一颗齿轮或一枚螺丝钉。这样的人才,类似商品的统购统销,便于国家统一管理,统一调配,可以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但这样培养出来的所谓“人才”,其人格缺陷非常明显:过于听命、服从,缺少创造力、情感力与想象力。这显然与“人的健全、和谐的全面发展”的现代教育理念背道而驰。在当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知识经济时代,国家对于人才的主动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确立、深化,计划体制下的人才培养模式必

须改变，代之以市场体制下的人才培养模式。

就语文课程来说，可作如下分析。

在计划体制模式下，全国只有一套语文教材，与批量生产人才的要求是一致的。语文教材的编写，经政府授权，配合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一部分人负责进行权威性的阐释，并要求语文教师按照这样的阐释去教育学生，不能“越线”。语文课程的学习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一种集体性的“政治阅读”，学生不得不用“被用旧了、磨坏了，既无限复杂又失去了弹性变得无比僵硬的字、词、语”（张新颖《黑暗中的声音》）去应付语文学习。相反，个人阅读、理解、阐释的空间和自由度很小，甚至一度被剥夺。在极“左”的年代里，喜欢看名著、写日记的学生，往往被斥为“小资情调”，甚至戴上对新生活不满的“帽子”。久而久之，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必然千人一面，说起话来同一种声音，写起文章来同一个腔调，学生个人情感和个体生活体验被严重忽视。这样的教育已经影响到我们整个民族的话语方式。在一些媒体上，少年儿童说的话与七八十岁老人说的话，其调子竟没有两样！全民族一度失语留下的后遗症已经开始出现。

旧的语文教育方式，在今天显然不合适了。一方面要求培养有个性和创造精神的人才，以适应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需要，使他们能够参与国际竞争，建设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却是旧的语文教育模式长期不变，无论从语文教育观念，语文教材建设，还是语文教学方法，或者是语文考试制度，甚至包括语文教育师资，都带着计划体制下的旧痕，与新时代很不协调。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使用的语文教材都是缺少时代感的老教材，其间虽经几次修订，但基本观念没有更新；语文教学方法也非常落后（教师满堂灌，学生死记硬背），几十年语文教学的“八股调”现在仍随处可见；语文考试制度过于强调标准化，一味追求标准答案，学生缺少自由发挥的空间。语文教育师资则更堪忧虑。这一切，从大的方面看，是文化、教育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小的方面看，是语文课程改革落后于时代的要求。这显然难以培养适应 21 世纪所需要的语文人才。

三、世俗化浪潮与语文课程改革

当前，物质生活和经济活动在大众生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大众的消费需要空前增长；同时，市场化、世俗化程度逐步加深，商业文化迅速繁

荣。与市场化、世俗化相关的现象包括商业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等新的文化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以及大众文化相继出现。这是当代文化转型的重要表征。如果说这股世俗化浪潮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较温和的面目出现,那么 90 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其来势非常凶猛,全面渗透到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这与计划体制时代的文化景观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思想界“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缘起,也与语文课程改革的当代困境有一定关系。

学校不是一方净土,它时刻与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讯手段的发达、大众传媒的普及,强化了这一联系。文化转型的加剧,文化世俗化浪潮的加强,盗版光盘、文化小报、娱乐周刊、武打言情、网吧、读图、家庭 Party、卡拉 OK、明星崇拜、生日礼物、名牌服装、西方快餐……这就是社会的大语文环境(经济越发达、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情形越是这样)。它们分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深刻影响着学生课堂外的语文生活。有些学生可以很长时间不学习课堂上的语文,却一天也离不开上面所开列的“菜单”。

社会文化大环境与课堂语文小天地之间的关系,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张过。这对传统语文教育无疑构成巨大的挑战。语文课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脱离社会,远离生活,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一方面,教师在课堂上批判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金钱的丑恶,歌颂精神的富有和物质的清贫,另一方面,社会现实却与之产生鲜明的对照,某种程度上给课堂上的说教一记“耳光”。这就使课堂的语文学习与社会的大语文环境,形成不协调的二重奏。结果是社会大语文的魅力,胜过语文老师对学生的宣传。学生对世俗文化是一种感情投入,语文课的学习却大多只能凭理性,靠强迫。其效果可想而知。喜欢语文的学生数量在不断减少。人文精神在流失。过去普遍认为,阅读文学名著代表一种修养,唐诗宋词赋予人一种特殊的气质;在冬夜暖融融的房间里,“一盏孤灯、一杯香茶、一把软椅、一个平和的心境,加上一本好书”,是世间难寻的幸福(陈染《我是主人》)。而今,这种价值取向已经失落,连小孩也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像顺口溜,不如看一部农民种田的电视专题片(池莉《新一代书生》)。人们躁动不安,社会之大,已经很难让人在灯下平心静气看完一本《红楼梦》。少数沉浸于其中的人,也被人认为是不合时宜。语文课程似乎正

在边缘化。

语文教育当然要联系社会与生活，与现实隔绝，关在小屋里做着春花秋月的梦，显然是不可能的。面对这个世俗文化越来越普及的时代，如何高扬人文主义大旗，既不取媚于世俗文化，坚守人文立场，又吸收世俗文化中有用的成分，转化为学生的学习资源？这值得每一个语文教育工作者思考。这也是这次语文课程改革所面对的重要问题。值得欣慰的是，几年来的改革，在引导语文教育工作者积极开发和利用世俗文化中的语文课程资源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四、民间文化资本与语文课程改革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提出著名的“文化资本”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由他的资本来决定的。只有他的资本进入了一个“场域”之后才起作用。地位之争实际上就是资本之争。资本有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而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三种最基本类型的资本。文化资本主要存在于知识与文化生产的领域，它往往不具有物质资本那样的可触摸性，但在社会支配与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同样十分重要。文化资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也是权力与地位的基础、支配与统治的基础。文化资本之所以被人争夺，是因为在一定的时期，资本的总量有限，所以某一个个体或社会集团的资本拥有量的增加，在特定时期意味着另一个个体或社会集团拥有量的减少。

我们据此可以分析半个多世纪以来官方文化资本与民间文化资本相互消长的大致情况。新中国成立后30年左右时间里，文化资本与政治资本高度统一，并由官方垄断，基本不存在民间文化资本。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部分文化资本在政治精英的支持下释放到了民间，成为民间争夺的一块“蛋糕”。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官方文化资本释放到民间，市场争夺也愈演愈烈。于是，出现了各种大众文化的弄潮儿：文化经纪人、民间书商、小报记者、专栏作家、网络办刊者、各种肥皂剧的制作人员、影视歌星等，他们分享了大批由市场分配的文化资本与文化权力。而少数精英知识分子也跃跃欲试，或亲自下海，一试身手；或成为民间文化弄潮儿手中的一支笔。他们有时互相争夺，有时又互相配合，共同形成一股民间文化力量，向官方文化发动冲击，夺取更多的文化资本。

这些年对语文课程的批评，有一部分可以认为是民间文化对官方文化的

不满和批评,他们不满于长期的垄断行为,要求与政府共享语文课程这块大“蛋糕”。说语文教育是一种官方文化,意思显而易见,那就是前面的分析所指出的,语文教育在阶级社会里,历来都代表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为特定的政治集团服务。这一特性在新中国成立后表现得极为突出,在一定时期内还走向了极端(如脱离语文进行空洞的“左”的政治思想宣传)。它在计划经济时代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它是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语文课程长期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有人形象地称它为政治斗争的晴雨表。这种中心地位,实际代表了一种官方文化的态度。这种文化资本,在计划经济时代完全被官方把持着,民间力量难有作为。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文教育在国家生活中有边缘化的趋势。就拿语文教材来说,由谁来编,怎么编,编什么,有了更大的自由(教材品种的多样化,当然有利于推动教育改革)。语文课程已失去其计划体制时代万众瞩目的位置。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拥有学生就意味着拥有财富。尤其是政府一度提出“教育是一项产业”的口号之后,拥有进入语文教育这个“场域”的文化资本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对这项“产业”有着浓厚的兴趣,跃跃欲试,上场一搏,分享这一部分开始松动的文化资本。他们之中有的来自民间,那些批评声音的背后,当然有些壮怀激烈的使命感,但也有些明显带着“取而代之”的目的。可以说,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与教育的其他领域一样,语文教育这一战场决不会宁静。

以上从当代社会文化背景角度来观照当前语文课程改革。多年来,对于语文课程,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已经不少。批评的目的在于建设。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似乎效果不佳,而应该进行“综合治理”,即把语文课程这项改革“工程”置于社会文化转型这个大系统“工程”中来考察,并就语文课程改革的各个环节制定相应的改革策略。

目 录

序	顾振彪 (1)
当代社会文化转型与语文课程改革 (代前言)	(1)
第一章 语文课程教材建设的回顾与反思	(1)
一 民国时期语文课程发展轨迹	(1)
二 民国早期文言教科书的编制	(6)
三 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课程发展历程	(15)
四 中学语文教材建设百年概述	(19)
第二章 语文课程教材建设的继承与创新	(25)
一 继承：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26)
二 传统：留给我们的一笔遗产	(35)
三 创新：继承的必然和发展	(45)
四 未来：语文课程教材建设的时代展望	(52)
第三章 21 世纪初的初中语文课程教材改革	(59)
一 语文课程改革十大聚焦	(59)
二 新理念·新教材·新教法	(64)
三 课程标准初中语文教材的历史继承	(71)
四 课程标准初中语文教材的时代创新	(76)
第四章 民族化、科学化、现代化的语文教材编制	(82)
一 语文教材编制的民族化	(82)

二	语文教材编制的科学化	(91)
三	语文教材编制的现代化	(104)
四	正确处理“三化”的辩证关系	(109)
第五章	历史坐标中的综合型语文教材	(114)
一	综合型语文教材的特征	(115)
二	综合型语文教材的类型	(118)
三	综合型语文教材的发展演变	(121)
四	综合型语文教材编制的理论基础	(130)
五	综合型语文教材的价值和局限	(138)
第六章	中西不同背景下的分科型语文教材	(141)
一	分科型语文教材的主要类型	(142)
二	我国分科型语文教材的发展历程	(146)
三	几种主要分科型语文教材类型的编制模式	(153)
四	分科型语文教材编制的理论基础	(162)
五	分科型语文教材的价值和局限	(167)
第七章	艰难探索中的高中语文选修课程改革	(171)
一	外国高中母语选修课程设置现状考察	(171)
二	我国高中语文选修课程教材的历史发展	(175)
三	课程标准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的编制特点	(181)
四	对高中语文选修课程改革的几点思考	(185)
第八章	喜忧参半的新世纪语文教学改革	(191)
一	当前语文教学改革中的成绩与不足	(191)
二	确定一节好语文课的标准	(198)
三	课程标准初中语文新教材的使用策略	(204)
四	语文综合性学习与课程资源开发	(210)
第九章	语文课程改革潮流中的中学鲁迅作品	(216)
一	中学鲁迅作品选编史概略	(216)

二	中学鲁迅作品解读史巡礼	(223)
三	中学鲁迅作品教学的得失与对策	(229)
四	中学鲁迅作品中的几个偷窃者形象	(236)
第十章	语文课程改革背景下的课文名篇解读	(244)
一	以小见大，寓情于理	
	——《灯下漫笔》	(244)
二	清幽典雅的小夜曲	
	——郭沫若的两首小诗	(247)
三	遥远而渺茫的追求	
	——《雨巷》	(251)
四	献给劳苦大众的深情的歌	
	——《大堰河——我的保姆》	(253)
五	见证农村文明蹒跚前进的脚步	
	——《哦，香雪》	(256)
六	对一个荒诞世界的独特叙述	
	——《十八岁出门远行》	(259)
	附录：如何实现高师中文教育与中学语文教育的成功对接	(265)
	怀土长留蝴蝶梦——怀念父亲（代后记）	(269)